

1990 武汉文史資料

一九九四年第三辑

毛泽东培训八百农民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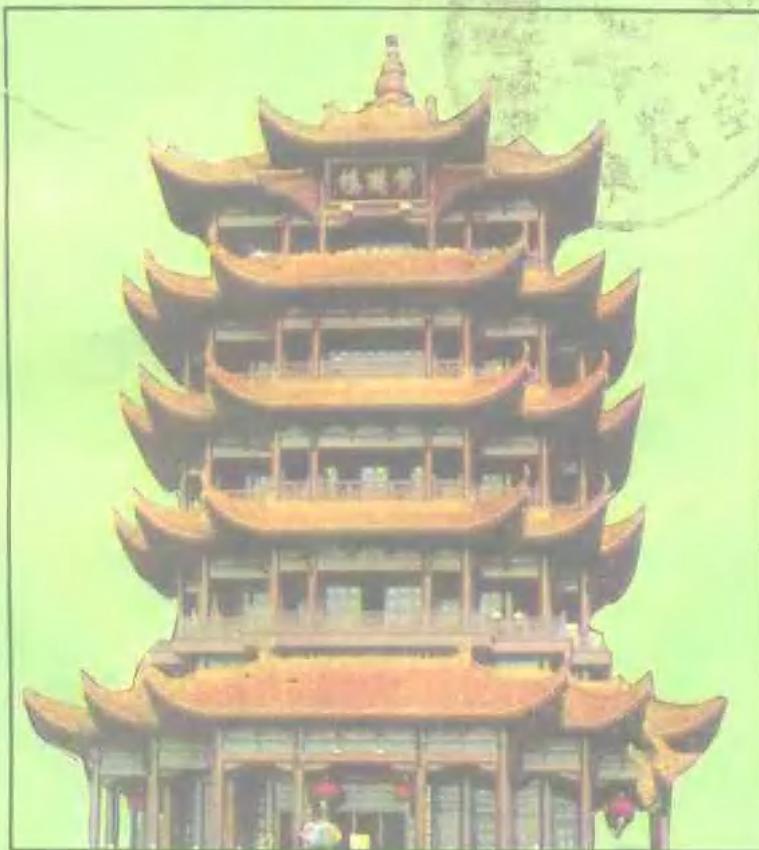
艾毓英八十自述

邹韬奋在武汉的战斗岁月

李宗仁南京撤退纪实

白崇禧军政生涯钩沉片断

国民党武官官场之我见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编:萧志华

副 主 编:刘通鸾

责任编辑:殷小琴

特约编辑:胡正信

 刘章顺

封面设计:王心耀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

1994年9月出版

出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发行: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编辑:《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印刷:武汉测绘院地图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36/K

广告许可证:工商广字01 30号

定价:3.00元

目录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

【1994年第三辑】(总第五十七辑)

本刊特稿

毛泽东培训八百农民革命军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实践活动..... 元软(1)

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在武汉 源清(11)

往事回眸

八十自述

——菱湖的化雨春风 艾毓英(23)

我给毛泽东当“信使” 陈大襄(38)

蒋、桂求和真象与湖北人民和平运动 谈瀛(44)

抗战初期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 刘静 萧扬(58)

李宗仁南京撤退纪实 徐世江(76)

主编:萧志华

责任编辑:殷小琴

副主编:刘通鸾

特约编辑:胡正信 刘章顺

2032/15

军政内幕

- “中统”调查科的组织和特务活动 郑大纶(81)
国民党武官官场之我见 符 浩(89)
汉口市参议员选举实录 樊 明(95)
监利县国大代表选举内幕 吴先铭(103)

人物纵横

- 邹韬奋在武汉的战斗岁月 朱生华(110)
白崇禧军政生涯钩沉片断 萧建中(123)
我和蒋纬国 胡成新(148)
我国司法工作的领导者魏文伯 许恺景 陈汉萍(152)
揭露武大“6·1”惨案的新闻记者陈仰平 王惠超(158)

烽火岁月

- 武汉解放前夕的一个地下油印小组 张昕若(160)
回忆民盟迎接武汉解放的活动 杨春波(172)
中原突围亲历记 张少卿(179)
烽火岁月负笈行 谢中枢(183)
邓锡侯率部起义前后 方镇华(194)

毛泽东培训八百农民革命军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实践活动

·元钦·

在这里所叙述的，是毛泽东主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前后后的事情，是一段真实、生动、感人的史实。

他从上海来

1926年11月，那是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长江流域的风雪日夜拼命地吹着飘着。这时，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身穿棉布长袍，颈上围着一条毛线围巾，脚踏一双布鞋，手里拎着一只竹箱，由上海匆匆往武汉赶来。

正当北伐军一举攻克了武汉，国民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提出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采取集中的原则，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他的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于是他立即离开上海，踏上征途，顶风冒雪赶来武汉。

一路上，他沿途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途经江西时，他特地到

南昌，和国民党省党部的同志商量由湘、鄂、赣三省在武昌合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毛泽东会晤了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主持政治部工作的林伯渠。

12月，毛泽东来到武汉，是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一面找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董必武交谈，着手筹备武昌农讲所；一面以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汉口特别会议。

当时，北伐战争取得巨大胜利，革命高潮已经形成，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也暴露得日益明显。蒋介石正在加紧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破坏工农运动，准备公开叛变革命。这时，革命形势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需要深入发展，巩固已取得的胜利，进一步发展扩大农民运动，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可是，陈独秀在特别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却一味指责农民运动太过火了。他认为，当前主要危险是民众运动的勃起和日益向左，人家（国民党右派）因为害怕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这左右距离拉远，因而随时随地都会使联合战线破裂。在中央特别会议上，苏联顾问鲍罗廷附合陈独秀的意见。陈独秀又进一步强调为了巩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必须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声称这是最重要的策略。

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结束了，毛泽东心情沉重。蒋介石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他没觉得奇怪，而陈独秀他们也口口声声说农民运动“过火”，要“限制发展”，这使他感到痛心。这时，陈独秀把湘区区委书记和毛泽东叫到一起谈话，要求他们回湖南及时纠正那里的农民运动“过左”行动。毛泽东提出了与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不同看法，摆了他在江、浙、赣实地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可陈独秀压根儿听不进去。

这时，毛泽东收到从湖南拍来的电报，请他回湖南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他把电报塞进衣袋里，决定应邀南下长

沙。

临走时，他去董必武的家里，谈及开办武昌农讲所的事，董表示大力支持，说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校舍就找地方给他。毛泽东诚挚地感谢董必武对他工作的大力支持。两人商定，等毛泽东从湖南开会回来再具体商谈办农讲所的事。

毛泽东告别了董必武，又去找邓演达交谈，他们从对农民运动的估计到筹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具体事宜，两人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毛泽东表示，这次回湖南参加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之后，打算到农村去实地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究竟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回来写个考察报告，回答那些人对农民运动的无端责难。邓演达表示积极支持。

1926年12月27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去长沙。

选择校址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返回武汉，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不久，杨开慧和母亲带着6岁的毛岸英、5岁的毛岸青及保姆孙嫂也从长沙来到武昌都府堤。

毛泽东回到武汉立即去找邓演达，通报了这次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谈到，他一共用了32天的时间，跑了1400多华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的农运情况。耳闻目睹的事实，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邓演达告诉毛泽东已筹集到汉阳造七九式步枪1000条，子弹10000发，军服900套，供农讲所学员训练所用，而且董必武已经选好农讲所的校址。

第二天，毛泽东和邓演达一起到董必武家里，董必武带他们来到武昌黉巷13号，看农讲所的校舍和场地。

这是座坐北朝南的大院，建筑面积4703平方米，占地而积为12850平方米。房屋有四幢，一、二、四栋为平房，晚清学宫式建筑。

砖木结构，青砖瓦屋面，檐下外回廊贯通。三栋为二层青砖小平瓦楼房。这是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的“北路学堂”，后来成为湖北省立甲等商业学校、湖北高级商业学校。商校并入了中山大学，刚刚搬走，空出了这座院落。董必武特函请省政务委员会拨出这个地方让毛泽东办农讲所。这时毛泽东和邓演达、董必武一边往里面走，一边察看着房屋、大操场。

董必武问毛泽东：“润之，怎么样？”

毛泽东满意地说：“这里很好。”

董必武转向邓演达：“演达，你说呢？”

“不错！”邓演达说，“学员上课的地方、住宿的地方、吃饭的地方和军事操练的地方都有了，这里的确很好。”

教学安排

1927年2月底，学员陆续来到农讲所报到注册。学员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17个省，共800多名。农讲所3月7日开始上课。学校边开学上课边等待学员来报到，直到4月4日才举行开学典礼。

农讲所开学之前，由湘、鄂、赣三省派人组成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湖南省党部推荐陈克文、周以栗为筹备员；湖北省党部推荐陈荫林、李汉俊、张眉宣为筹备员；江西省党部推荐龚式农、王礼锡为筹备员。他们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积极开展工作。3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通过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章，决定农讲所第一期学习期限为4个月，并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农讲所常务委员。实际上是毛泽东主持全所工作，参与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选聘教员。

这时，毛泽东的工作十分繁忙，一面带领大家建立总队部、常委办公室、教务处、事务处、庶务室、医务室等机构；一面组织大家认真讨论、安排教学内容。当时农讲所开设《三民主义》、《中国民族

革命史》、《各国革命史略》、《社会进化史》、《中国政治经济学》、《中国职工运动史》、《农民运动之理论和策略》、《帝国主义与中国》、《农民组织及宣传》、《农民自卫》、《军事训练》等科目。毛泽东亲自主讲《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教学内容丰富具体。担任教授科目的教员有：李达、余鸿鑑、陈其瑗、恽代英、李立三、陆沉、邓初民、夏明翰、李汉俊等，还请徐谦、鲍罗廷等作特别演讲。

邓演达看了教学内容的科目，高兴地称赞毛泽东办学有方，教学内容安排很好，既有军事、政治、经济、历史，又有农村教育和农民运动的理论。毛泽东说：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农村教育各科教员都已聘请，就是军事教官还要仰仗你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了。邓演达当即回答，这个没有问题。立即抽调教官去农讲所任教，要多少给多少。

邓演达和毛泽东真诚而又密切的合作，解决了武昌农讲所面临着的许许多多的具体困难，使农讲所安排的教学计划得以实施。毛泽东赞扬邓演达是国民党真正的左派。

从全国各地前来农讲所学习的学员，是由国民党各省省党部选择推荐和出具的介绍信来报名的，经过考试《国文》、《党义》、《农村常识》等科目及格方可入学。3月7日农讲所开学这天，校园格外热闹，政界、军界、商界的知名人士和农工代表以及外国友人来到农讲所祝贺。毛泽东特地邀请董必武作报告。

自3月7日这一天始，农讲所的师生进入了紧张而又有秩序的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

学生《规约》

现在，人们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走进第一栋那间大教室，都会清楚地看到讲台旁墙壁上用仿宋体字样书写的学生《规约》。当时毛泽东主办武昌农讲所，为了让学员明确参加革命的目的，培养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立场，明白自己的革命责任，

特地制定了这个学生《规约》。

毛泽东要求学员懂得参加革命的目的。在《规约》的开头这样写着：“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进来这里的目的并不和他们进普通的中学大学一样，”“我们进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除农民群众的痛苦。”《规约》言简意赅，学员们看了容易理解。

毛泽东要求学员自觉地改造自己，要和封建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在《规约》里把学员个人思想改造郑重地提出来：“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带来了不少的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我们责任这般重大，我们要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扫除。”毛泽东认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必然影响个人的政治立场。因此，他强调学员思想作风改造和世界观的改造。

那些极端仇视而又害怕工农的国民党右派和各地土豪劣绅，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向工农群众进行猖狂反扑。他们不仅竭力诋毁农民运动，而且制造流血事件，直接屠杀农协会干部。1927年2月，湖北阳新县的土豪劣绅勾结匪徒，杀害该县农协会干部和工作人员9人。监利、天门、沔阳、钟祥等县也发生了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捕杀党员、捣毁党部的事件。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为了适应农民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注重学员的军事训练，注意把学员培养成农民武装的骨干。他在学生《规约》中规定：“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每个学员都“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规约》中的这些话说得很中肯，很深刻，令人振奋。

毛泽东为了训练出一批能够组织领导农村农民武装斗争的人才，他在农讲所设立训练处，并成立训练委员会和军事教育委员

会，负责学员的军事训练。他把全体学员分为四队和一个特别训练队，设有总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学员学习生活军事化。军事教官每天操练学员 2 小时，每周上一次军事理论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学员的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的时间每天增至 4 小时，他经常在大操场检查训练情况。

学生《规约》贯穿在整个农讲所的一切活动中。毛泽东不仅要求学员严格地自觉地遵守《规约》，认真刻苦地改造封建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学好农讲所安排的各项学习科目和军事训练，而且连学员房里的步枪、大刀梭镖以及毛巾、小瓷缸、绑腿带、八角帽等武器和生活用品，都得井井有条地摆放着，学员们过着纪律严明的军队式的正规军事生活。

肃反斗争

毛泽东主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正是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农民协会在乡里跟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清算剥削帐。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逃避农民群众的斗争，纷纷逃到长沙、武汉。武昌农讲所学员中也混进了一些反动组织的成员。

跑到武汉来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不法地主制造谣言，恶毒攻击农民协会在乡里“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毛泽东找到农讲所教务处主任周以栗商量，组织学员宣传队上街宣传。学员们排着队，唱着《打倒列强》、《农工歌》、《少年先锋之歌》等革命歌曲，走上街头，走进茶楼，向群众宣传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揭露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学员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国民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等口号，拥护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正确主张。学员宣传队受到广大工人群众和市民的热烈欢迎。

这期间，农讲所发生了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一天夜里，隐藏

在农讲所里的一名反革命分子，趁学员们睡着之机，用硫酸往学员的头上淋，受害的学生惨叫不迭，痛不欲生，其他人目睹惨状，惊恐不已。有个学员吓坏了，写了一封信放在教务处的办公桌上，遂用刀片自杀，幸亏发现及时，抢救脱险。教务主任周以栗连忙去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认为，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必须立即在农讲所内部开展肃反斗争，并且进行仔细摸底，拟定具体的肃反斗争方针。

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农讲所的校务会议，很快就制订出了肃反的具体措施，组织了强有力的肃反班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了解，抓获反动分子 30 余人，他们中有右派的中坚分子、国家主义派、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左社分子等，并查获炸弹、文件、书信等罪证。其中有特派员训练班区队长梁厚亭，教员张德金等。

肃反斗争取得了胜利，农讲所的师生欢欣鼓舞，十分开心。毛泽东对周以栗他们说：“对付反革命分子就象扫地一样，你拿扫帚一扫，灰尘就都扫掉了。”

听了毛泽东幽默风趣的话，周以栗他们笑了起来。

师生参战

“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举起屠刀残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而陈独秀仍实行右倾投降主义，限制工农运动，这大大地助长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1927 年 4 月，湖北黄安、麻城两县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南部的反动武装，在麻城县连续制造惨案……

麻城告急！

中共湖北省委同毛泽东商量确定，在董必武的支持下，毛泽东立即派出 200 多名武装学员，随同省政府警备二团一营驰援麻城，剿灭匪徒。

毛泽东派出的 200 多名武装学员号称一个营，他指定大队长傅杰为营长参加平叛。天亮的时候，农讲所的大操场上站着整装待

发的参战师生，毛泽东来到列队而站的学员面前，认真检查他们携带的枪枝弹药，要求他们英勇杀敌，平定叛乱，凯旋而归。他反复强调两句话：我们不打红枪会，只打利用红枪会的土豪劣绅；我们不打红枪会，只打欺骗会员传授邪术的头子。最后他下令：

“同学们，出发！”

傅杰营长率部出发了，他们迎着曙光，踏上征途，高唱《少年先锋之歌》：

走上前去啊！

曙光在前。

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

开自己的路。

向前，

稳着脚步……

毛泽东和周以栗他们站在校门口，目送着这支威武雄壮的农民大军远征而去。

学员们密切配合省政府警卫二团一营作战，剿灭匪徒，平息了叛乱。胜利归来的时候，毛泽东和农讲所的学生、教职员站在校门口，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热烈鼓掌欢迎。

5月17日，夏斗寅公开反叛，他趁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北上河南与奉军作战，武汉防备空虚之机，从宜昌沿江潜师南下，径袭武昌，妄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取而代之。

叶挺毅然率领独立师前往武昌纸坊一带迎战夏斗寅。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夏斗寅反叛部队的进攻，取得了平叛的胜利。

5月21日，驻长沙的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工农干部，当时人们称之为“马日事变”。

毛泽东逐渐清楚地看到，共产党自己没有工农武装，没有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革命军队是不行的。他下决心抓枪杆子，他认为“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于是，他更加注重抓农讲所学员的军事训练，他经常和军事教官一起，操练农讲所这支 800 农民军。学员们每天在大操场上摸爬滚打，个个一身热汗，人人浑身泥土，还不断进行野外军事演习。

周以栗对毛泽东说：“润之兄，学员们操练很辛苦哩！”

毛泽东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苦练很有必要。”

周以栗说：“怎么练也只有 800 人马。”

毛泽东笑道：“点着一盏灯，可以照亮一片地方；点着 800 盏灯，你说能够照亮多大的地方呀？”

周以栗听后点点头笑了。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经过 3 个多月的理论学习、军事训练和实际战斗，锻炼成了农民运动工作的骨干和军事人才。6 月 18 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向全体学员颁发刻有“农民革命”的铜质五星证章。学员们回到本省本籍，大多由各省农民协会委任为省农协特派员，从事农运工作，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本刊特稿·

大革命时期 刘少奇在武汉

·源清·

1926年10月21日，刘少奇受中共组织的派遣从广州来到武汉。当时，国民革命军刚刚攻克这座古老的华中重镇。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负责人李立三、项英、许白昊等迎接他。

汉口友益街16号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办公的地方。这座西欧法式楼房，原是军阀吴佩孚的部将陈汉卿的私宅。北伐军攻占汉口后作为逆产被国民政府没收。这里曾一度成为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刘少奇就住在总工会附近的友益街尚德里4号楼上。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在武汉开始了新的紧张的战斗生活。

罢工斗争风起云涌

刘少奇带着跟他一道来汉的两位广东同志，先后到刚刚恢复

活动的太古码头、怡和码头、英美烟厂、申新纱厂、武昌一纱厂、汉阳兵工厂、粤汉铁路、京汉铁路和人力车、水电等行业工会，和新组建起来的五金工会、黄包车工会了解工运情况。还到湖北应城矿区实地考察。

当时，湖北邮务工人同英国在华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邮务工人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待遇，向邮务当局提出了合理的要求。岂料英方代理人不肯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还蓄谋破坏工会组织，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竟将武汉邮务工会委员长调走，同时无理开除4名邮务工人。刘少奇得悉此事，来到邮务工会，组织和领导邮务工人开展了罢工斗争。

邮务工会在汉口血花世界（今汉口民众乐园）举行罢工大会。工会负责人把刘少奇同他们一起商量拟定的关于增加工人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劳动待遇及不得开除工人等11项条件在会上宣读，要求邮务当局答复。

罢工后第三天，邮务当局迫于工人们的强大压力，他们不得不跟工会谈判……。

邮务工人的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邮务当局被迫签字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各项要求。

邮务工人的罢工胜利，犹如巨石落入长江，激起冲天浪花，武汉工人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就在邮务工会举行罢工以后不久，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汉口分会的海员工人同日本在华势力及其代理人进行了斗争，刘少奇参加和领导了这一斗争。海员工会向日商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8项要求，日商拒绝工会的要求。罢工持续了两周，还没有结果，大家着急了。刘少奇很清楚，海员工人这次罢工斗争的胜败，关系到整个工人运动的发展。如果不能取胜，那么刚刚签字答应工人条件的邮务当局就会有反复，别的行业工会发动群众开展罢工斗争也就更困难了。因此，他激励海员工人兄弟罢工到底，争取胜利。

正如刘少奇所预料的那样，海员工人罢工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日商及其在汉口轮船公司的代理人被迫接受了海员工会的要求，工人每月增加8元工资。

继海员工人罢工后，武汉地区又连续爆发了英美烟厂工人反对英帝国主义压迫的罢工、既济水电公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洋务工会为反对外国资本家压榨，要求提高工薪的罢工……。

随着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刘少奇决定撰写关于工会组织和思想建设论著，以资提高各级工会的战斗力。

风雪之夜写工运

刘少奇热心于工人运动，他怀着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兢兢业业工作。1925年，他曾与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在上海领导20万工人和市民同英、日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经历过“五卅”惨案的战斗。1926年，他在广州同邓中夏、陈延年、苏兆征等领导过省港大罢工，邓中夏说他是“工人阶级的最奋斗最勇敢的一位战士”。来到武汉，他立即投身到工人运动的洪流中，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对于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他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具体指导和亲自组织下，武汉地区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各行各业工人群众，争取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的罢工斗争如火如荼。李立三、刘少奇和项英等人日夜奔走于武汉三镇。刘少奇每天一早出门，很晚才回到汉口友益街尚德里4号住所。他顾不上休息，坐到窗前的灯下，铺纸执笔，伏案撰写《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和《工会基本组织》等书，提供给各级工会及工友们阅读，以使大家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在那座简朴的住宅里，无数个风雪之夜过去了，烛光、炭火伴着他写作。他终于写完了《工会代表会》、《工会经济问题》、《工会基本组织》这三本书，他拿起文稿仔细阅读，翻开《工会代表会》扉页，开头写着：“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同时又一定是民